

刘邦立
著

银行

行长

吉林大学出版社

刘邦立
著

I247.5
906

银行

行长

吉林大学出版社

ADA32/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银行行长/刘邦立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3.12

ISBN 7 - 5601 - 2680 - 4

I. 银… II. 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1588 号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解放大路 125 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数: 320 千字 印张: 12

印数: 1—10,000 册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陈 征 责任校对: 方 毅

封面设计: 九 子 版式设计: 任 刚

ISBN 7 - 5601 - 2680 - 4/I·061 定价: 22.00 元

序言

来世的肖像

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只差那么几天，刘邦立就再也收不到关于他的这本书能否出版的消息了。他在给我寄出那一摞书稿和附信后仅一周，突然跌倒不起。我没有马上知道他的死讯。我很忙。几天后，我按附信上写的号码打电话过去，刚说“请问刘邦立在吗？”电话那头一位女子便低泣起来，轻轻艾艾的声音传过来：“他不在了”……好半天，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我今天捧起这本装帧精美、印有“刘邦立著”字样的书籍时，恨不能敲开阴间的大门。

其实，我至今仍然记不得他。是他在附信中告诉我，我们曾经是北大的同学，他高我三级。我入校时，他那个年级下乡四清去了。他们1966年回校，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那样的动乱中，我们这一类人又激奋又烦躁，没有耐心去认识别的人。他却不

一样。他回忆说，他先觉得我的名字很特别，然后读我的署名大字报，欣赏我的文和字，然后就注意我记住我。显然，他是个有心人。所以毕业后，不管有多少坎坷，不管怎样频繁和悬殊地调动工作、变换住地，他都能平静、细细地回忆走过的路，认真咀嚼生活的酸甜苦辣。他寄来《银行行长》一稿的同时，寄来了他几年前写的自叙体小说《我是“四不像”》，副题是“一个北大毕业生的故事”。文字流畅自然，带着淡淡的幽默、自嘲，淡淡的悲哀、忧伤，但丝毫不沾染无望的情绪。书中插图有一帧他与同学在一起的照片。我仔细辨认，还是记不起他来。照片中，他是那么年轻，长得很周正，微笑着。写到这里，心脏一阵紧缩一阵痛。这样年轻、周正的脸庞，这样真诚的微笑，永远消失了。其实，在他写《我是“四不像”》时，这些就已经消失了。后来，他又用二三年时间，抱病写了现在的这本书。书中的故事不是凭空捏造，而是他亲身体会过的。也许他想让“四不像”的自我获得新生，便在书中赋予主人公干练、精明、现代的素质，而且年轻俊朗，握有权力，还有漂亮的情人。所有这些是“四不像”的刘邦立所没有的。但是，新生的“自我”，毕竟还是“自我”。他在黑与白之间周旋，却出污泥不染；他圆滑变通，却刚直不阿。无法摆脱的是，刘邦立最终还是给了他一个悲剧的结局。

刘邦立短短的一生写了两部书。一部书写了一个真实的自我，另一部书写了一个新生的、希望的自我。两部书为他的一生树立了墓碑，为他的来世描画了肖像。

也许我可以不再自责了。我把他来世的肖像奉献在他的墓前。

姚东桥

2002年8月28日

第一章

1

康平国际银行副行长秦晓禾，坐在自己办公室里那把舒适的黑色真皮高靠背大班椅上。隔着深褐色亚光漆的办公桌，对面两把椅子上是一胖一瘦两位客人。

胖的一位身穿一套铁灰色西服。料子很薄，但很挺刮。雪白的衬衣、红色的领带，都是高档货。可惜这位胖客人却把西服袖口上的商标留着没撕去。

因此，秦晓禾对面前的两位客人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二分鄙视的情绪。今天星期五，按国际流行的观念，周末上班可以穿得随便点。所以平常也是西装革履的秦晓禾今天穿的是一件墨绿色皮尔·卡丹纯绵T恤和一条土黄色卡叽布休闲裤。脚上是一双软底皮便鞋，深棕色的，与裤子的颜色十分搭配。

秦晓禾不由自主地跷起二郎腿，右手有意无意地按着办公桌

上那台电脑的鼠标，微微扬着头，似注意非注意地在听着胖客人的话。

胖客人毕恭毕敬地双手把一张信笺递给秦晓禾，声音十分谦和地说：“这是市里夏市长的信，请秦行长看看。”

秦晓禾一听“夏市长”三字，心中一个激灵，连忙集中起精神。他接过信笺一看，“康平市人民政府用笺”的红色宋体字下面，是几行从右到左的毛笔字：“云继同志：兹介绍好望集团总经理郝会振先生前往贵行商谈申请贷款事。郝先生是我市民营企业的翘楚，纳税大户，资产雄厚。望大力支持为感。”下面是夏市长那龙飞凤舞的签名：夏聚炎。

夏市长亲笔信的收信人“云继同志”是康平国际银行的正行长何云继，秦晓禾的顶头上司。郝会振到秦晓禾办公室来之前，已经去找过何云继。因此，信笺的左边也有何云继批的字：“请晓禾兄大力支持。云继”。何云继给下级下条子办事，从来不称同志，而是称“兄”——秦晓禾比何云继大四五岁，称“兄”似乎还说得过去。但何云继对比他年轻的下级下条子，也是称“兄”。开始秦晓禾还有些不明白，后来才知这是从港台商界学来的：不管对方比自己大还是比自己小，对人一律称兄，以示自己虚怀若谷。当然也不是对任何人都能称“兄”。第一，对上级绝不能称“兄”——无论是年长的上级，还是年轻的上级，都只能官称。比如秦晓禾要给何云继写请示报告，就必须写“云继行长”。若是写“云继兄”，何云继肯定不高兴。第二，对女士不能称“兄”，只能称“××同志”。女的当然不是“兄”，那么称“姐”、“妹”不行吗？不行！称“姐”道“妹”，是风月场的规矩。何云继、秦晓禾给自己的女下级下条子、写批示时，如果写了“××姐”、“××妹”，对方不但会笑掉大牙，弄不好还会到上面去告发你有“性骚扰”的苗头。

市领导亲笔、顶头上司有正面意义批示的介绍信，使得秦晓禾再也不敢小视这位穿西装不撕商标的郝老板了。他下意识地放下了二郎腿，右手也从鼠标上收了回去，坐直了身体，对郝会振说：

“既然是市长介绍来的，又有行长的批示，我一定尽力。请郝老板谈谈你的业务情况和需要的资金数目吧！”

郝会振嘴角上很快地闪过一丝不易为人觉察的笑容，他睁大了那对因太胖而显得有些眯缝的猪泡眼，指指坐在自己身边的瘦子说：“这是敝集团副总兼财务经理钱传之，我请他代表我把详细情况向秦行长汇报一下！”

2

康平国际银行是康平市惟一一家市属银行。其它的银行，如工行、农行、中行、建行，总行都是在北京，设在康平的机构只是分行，经营行为要受总行宏观节制。惟有康平国际银行，总行就在康平，一切自己说了算。当然，康平市领导的话还是不可不听的。因为何云继行长的乌纱帽是在市委组织部手中，何云继的身份与郝会振那样的私人老板还是不同的。

康平市古称康平府，下辖十多个县。康平二字，含“西扼康巴，东望平川”之意，是我国西部一个很有名的地方。滚滚的康河，由西北山中流来，穿康平城而过。因地势自此由山地变成了平原，康河也由咆哮而变得温顺了，在平原东南部静静地注入扬子江。古代的康平，既有山区丰富的资源，又有平川富庶的农产，历来是朝廷赋税的重要来源。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很重视康平的持续发展，将1949年后一直是“地区级”的康平专区升格为副省级的康平市，辖地也由十多个县扩大为30个县及县级的区、市。级别一提升，建设也跟了上来。原先康平市区的康河上只有靠东南角的一座钢桥，还是50年代苏联专家帮助修建的，已经十分陈旧，通过能力也有限——50年代汽车少，钢桥的设计通过量是十吨，也就是同时在桥上至多可以通行两辆五吨重的汽车。一旦往来的车辆过多，就得加以限制：桥东站一位交警，桥西站一位交警，两人各拿两

面红绿小旗。东头有两辆卡车要上桥了，东头的交警就高举小绿旗，西头的交警看见了，就得赶紧举红旗，阻止西头的车上桥……这种土办法，当然给交通带来了许多不便，特别是后来汽车渐渐多起来之后，康平桥成了远近闻名的“瓶颈”，司机们提起过康平桥就大摇其头。其实当时的康平地委和康平专署的领导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并且心中已经有了动人的远景规划。一位1955年到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考察后回来的地委书记，当年在地区三级干部会上报告访欧观感时就曾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同我们康平地区的面积差不多。它的首都布达佩斯，有多瑙河穿城而过，同我们康平城有康河穿城而过的情况也差不多。可是布达佩斯的多瑙河上有五座桥，把河两边连成一气。桥上华灯排排，入夜一片璀璨，使布达佩斯有多瑙河上的明珠之美称。我们康平城区的康河上，才只有一座桥，而且通过能力十分有限。老百姓过河，多半还得靠小木船摆渡。这是不行的！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不能允许的！我们也要在康河上建第二座桥、第三座桥、第四座桥、第五座桥。使我们康平变成康河上的明珠，变成中国的布达佩斯！”

地委书记的豪言壮语，博得了听报告的地、县、区三级干部的阵阵掌声。“中国布达佩斯的叫法不胫而走。可是康河上拟建的四座桥呢，从1955年到1980年，25年间一座也没见架起来。就连康河上这惟一一座桥，1958年也有人建议把它拆了，把拆下来的钢铁构件拿到土高炉里去炼成“钢”。1966年又有红卫兵在桥头贴出大字报，说这座桥是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建的，应该炸掉。理由是“我们有志气的康平人民宁坐社会主义的木渡船，也不走修正主义的钢铁桥！”幸好有驻军首长出面制止。因为这座桥是通往西部边防线的咽喉要道，炸了怎么得了！就在红卫兵闹得最不可开交的那几天，驻军首长只好请了几位康平出生的老红军战士每人端把藤椅在东西桥头坐了几个通宵，才把红卫兵疯狂的炸桥企图制止了。

总之，直到70年代末，康平城河面上仍然只有一座桥。到了80年代，康平升格为副省级城市了。当康平的各级政府部门、各机关团体、银行、公司，都把自己的办公楼往副省级的规格上靠的时候，新的市领导们不约而同地回想起50年代那位地委书记的豪言壮语：“把康平建成中国的布达佩斯”。于是这个口号又一次被提了出来，而且很快变成了现实：康河上陆续架起了四座大桥，老钢桥南面两座，北面两座。接近老钢桥的两座桥，环城一路跨过它们形成一个圆圈。这两座桥中，老钢桥北的一座是石拱桥，取的是河北赵州古桥的式样、单跨双曲拱，材料是用的康平山区常见的红豆花岗石——如今这种石头已打进国际石材界，人称“康平红”，在欧洲市场十分抢手。幸好这座桥是在红豆花岗石还没有名气的1983、1984年建的，要是现在建恐怕市政工程局的预算是承担不了“康平红”的天价的。这座桥取名“康红”桥，隐含用“康平红”花岗石建成之意。

老钢桥南边的那座桥，是一座钢索斜拉吊桥。夏聚炎市长前些年担任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时，到欧洲考察期间从奥地利维也纳的多瑙河上看到了一座斜拉吊桥，十分中意，随手拍了张照片带回来。后来在讨论建桥时，夏副市长力排众议，坚持这一座桥按他的照片修。他说：“以前只知道欧洲多瑙河上的明珠是布达佩斯，这回才晓得维也纳也在多瑙河上。它无论是桥也好，城也好，都比布达佩斯还漂亮。要说布达佩斯是多瑙河上的明珠，那么维也纳就是多瑙河上的钻石。咱们当年想学明珠没学成，现在该学钻石了！”于是一座钢索斜拉吊桥在康河上的老钢桥下游百十公尺处架了起来，夏聚炎为它取名“仿维”桥，寓“仿照维也纳桥”之意。此桥颇具现代化气息，本城居民和来访外宾对它都赞不绝口。夏聚炎也因建桥有功，不久“副市长”的“副”字就去掉了，当上了副省级的康平市市长，地位仅次于康平市委书记，是全市的“二把手”。

环城一路通车后，又修了环城二路，于是康河上又架起了两座

桥，一座是提篮式，远看去像一道彩虹，就叫彩虹桥。一座是门式吊桥，仿的是美国旧金山的金门桥。这又是夏聚炎市长参加中国市长访美团回国后建议修的，而且建议也取名为金门桥。因为这座桥建在康平城最南端，同新修的连接康平与东面的大平原的高等级公路衔接，外来的车辆大都从这儿进出康平城。给它取名金门桥，倒也贴切。好在美国旧金山的金门桥并未申请过名称专利，否则美国人也许会来找康平人打侵权官司的。

康平国际银行办公的地方叫康银大厦，是康平市最气派、最漂亮的建筑。说它气派，是因为它不只是康平市的最高建筑，也是西部目前最高的建筑。它共有 29 层，其中三层为地下停车场，地面为 26 层。四四方方，恰似一座高塔，耸立在康河西岸的沿江大道旁。大厦的外墙是用珍珠色的花岗石板材“干挂”而成的。这些花岗石板全从意大利进口。当初建楼时，有人建议用本地著名的“康平红”花岗石，可是康平国际银行行长何云继坚决反对。他说，“康平红”在国际上有点名气是不假，但是在我们康平市本地却滥了市，河上的桥用“康平红”，市府大楼前面铺人行道用“康平红”，好多老百姓装修住房，客厅里也铺的是“康平红”。咱们这座大厦，名为“康银大厦”，是康平市的脸面建筑，一定要在材料使用上有所超越！

康银大厦正式投入使用至今还不到六年。但它的主人康平国际银行却已有十多年“行龄”了，只是前些年它一直是租用临江宾馆的房子办公。临江宾馆是康平市最漂亮的宾馆。它的前身，康平市人民政府交际处，是解放初期由政府没收的康平最大一个军阀公馆改成的。公馆占地一百多亩，里面有小溪，有果园，有山丘，有草坪，十分幽深雅静。而建筑物只有一栋二楼一底的灰砖洋楼，掩映在翠海绿波之中，既漂亮又有点神秘莫测的味道。市府交际处进驻后，又盖了几栋小别墅，散布在山丘之下、小溪之畔，成了康平市接待上级首长和外国来宾的招待所，并不对外营业。改革开放后，外来人员急剧增多，几栋小楼已不敷使用。市府于是下定决

心，把招待所院内全部小楼一齐推倒，盖起了一栋 16 层的大楼，对外改称临江宾馆，内部仍属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领导。市里又从香港聘来几位专家当总经理和客房部、餐饮部经理，原来的招待所于是成了星级酒店，兼内部接待和对外营业的双重功能。

康平升格成副省级城市后，市里领导便定下了“积极引进外资，把康平建成中国西部的国际大都会”的方针。引进外资，总得有个金融单位出面去引才行。市里已有的金融机构，都是这个银行、那个银行设在康平的分行支行，严格说并非一级法人企业，代表康平市对外签约的权威性大大不够。市领导便向中央打报告，要求成立一家地方性银行。这家银行既要是百分之百的康平当地的一级法人，又要有直接从海外借入资金的权力。由于康平是西部少有的副省级城市，加上夏聚炎副市长又认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管理司的领导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高层，所以康平市成立一家地方性涉外银行的申请北京方面很快就批下来了。这家银行定名为康平国际银行，注册资金人民币 20 亿元，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给它颁发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上表明它可以经营境外外汇借款业务。

3

康平国际银行成立后就在全市 30 个县市区范围及相邻省内招聘业务干部，秦晓禾便是当时应招入行的。

秦晓禾讲得一口十分地道的康平土话，但他讲起北京话来那个溜劲儿，又让人听不出半丝康平口音。原来他既是康平人，又不是康平人。秦晓禾的祖父是康平山区一个大土豪。1946 年这位大土豪用重金送他儿子到北平读燕京大学新闻系。1950 年春天这位儿子毕业时，正值新中国刚刚成立。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他便被分配进入北京新华通讯社总社，在对外

宣传部当记者。这位记者便是秦晓禾的父亲。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十分重视英语教学，所以秦晓禾的父亲在新华社对外宣传部里当时是英语水平的头一份。他人年青，长得也很潇洒。既是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又是大学科班出身。这种完美的身份，自然博得了女孩子们的青睐。1951年，他挑来挑去之后，终于同本单位一位最漂亮的姑娘结了婚。次年生下一个又白又胖的大小子，取名秦晓禾。1966年秦晓禾在北京念书刚念到初一，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全国大、中、小学一律停课闹革命。14岁的秦晓禾在全国各地大串连一番回到北京后，发现父亲已被新华社里的造反派打成了牛鬼蛇神，并被大字报定性为“地主土豪的孝子贤孙、司徒雷登的忠实走狗、混进党内的阶级敌人”。司徒雷登曾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后来又做过美国驻华大使。伟大领袖毛主席在1949年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后，曾写过一篇十分有名的文章叫《别了，司徒雷登》。从此司徒雷登就以美帝国主义顽固分子的身份在中国臭名远扬。司徒雷登的忠实走狗自然是一顶吓人的政治帽子。再加上“地主的孝子贤孙”和“混进党内的阶级敌人”这两顶同样吓人的帽子，秦晓禾的父亲顿时在北京新闻界也臭名昭著了。在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年月，秦晓禾在学校里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

1969年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了。秦晓禾所在的学校全体“老三届”被分配去内蒙鄂尔多斯草原集体插队当牧民。秦晓禾因为在学校不但拒绝表示与“反动父亲”划清界线，反而留在家里跟父亲偷偷学英语，所以与同学们关系非常紧张。不仅被开除了红卫兵组织，而且连军训都不许参加。说是“怕他在实弹射击时掉转枪口杀害革命造反派”。秦晓禾想，若要与同学们集体去内蒙，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于是他干脆来个远走高飞，按照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可以投亲靠友的政策请妈妈给远在父亲老家康平的姑妈写了封信，由姑妈替秦晓禾在康平属下的宝华县山区某公社联系

了一个插队的地方。秦晓禾于是成了宝华县的插队知青。

秦晓禾是宝华山区方圆几百里惟一的北京知青。他普通话讲得标准，知识面广，人又和气，深得广大贫下中农欢迎。下乡不到半年，就被抽到公社小学代课，挣了两年轻松工分。两年后公社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又把他推荐进了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公社领导们做好人做到底，在秦晓禾离开农村之前，又紧急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秦晓禾在西南师范学院学了些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孔老是复辟的急先锋等当时最时髦的历史知识，并从中共预备党员转成中共正式党员。三年后毕业时，他被分配到康平第一高级中学当了历史老师。

在康平一高，秦晓禾虽然教学的效果还不错，但他对当中学老师一直心有不甘。当年上大学、念师范，并非他本人所愿，是形势使然。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秦晓禾便决定去报考研究生。报考什么专业呢？初中才上了一年就辍学的他，报理工科自然没有把握。他想，自己既然有学历史的底子，那就报历史专业吧！可研究先秦史、罗马史、中古史、近代史，均非他之所好。选来选去，他选了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史专业的研究生。一来这个专业全国只有西南财大有。既是冷门，又是独门。导师是全国知名的金融史权威、一级教授傅庆规先生。秦晓禾想，如能继承傅先生的衣钵，在金融史领域里出人头地，也算不错。主意打定，他就去报了名。他有学历史的底子、又有来自其父的英语家学渊源，自然一考就考上。三年后他获得了金融史的硕士学位，本来他想谋个社科院什么研究所的职位，但没有成功，而是留校当了傅庆规先生的助教。

秦晓禾在宝华县山区教公社小学时，就不安于教职。只是因为教书挣工分无论如何也比下田挣工分强，才勉力教了两年。后来他作为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分配去教中学，仍然不安于教职，伺机以考研为跳板脱离了中学教师队伍。研究生毕业当了硕士，成了

大学教师，教授的闪光头衔已经在向他招手了，可他依旧不安于教职，总在找机会跳出“教门”。加上他在学校里又遇到一件很难处的感情纠葛，更促使他急于离开西南财大。康平国际银行招聘干部的广告在报纸上一登，他就坐不住了。他想，康平国际银行是新型的地方性涉外银行。看起来资金不如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雄厚，网点也不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多。但它是康平市政府惟一的对外融资窗口，老百姓都说康平国际银行是“市政府的幺儿”。趁它新成立时进去，熬它十年八年，就是这家银行的元老了。论前途、讲实惠，哪方面都绝对比在西南财大当教师强。对，是得去！他这么一想妥，就立即行动起来。

康平国际银行的招聘条件很苛刻。不但指明要40岁以下的男性，研究生以上的学历，还要至少三年在相关部门工作经历。前两条秦晓禾都满够格，第三条他却犯了难。当时他在西南财大教书倒是已经满了三年，可是金融史专业教的却是银行的起源，货币的变迁，钱庄票号的兴衰之类的离现实金融业务很远的东西。这样的“三年相关部门工作经历”拿到台面上一摆，康平国际银行多半不会感兴趣。怎么办？秦晓禾想来想去，想出一个歪点子。他跑去找到学校人事处专管档案的王科长，说：“王兄，我想到康平国际银行去应聘，面试人家已通过了，马上就要来调档案。你是晓得的，凭我那金融史专业研究生的头衔，人家是不会要我的。拜托老兄把那个“史”字给我改成“学”字，我就变成了金融学研究生了。这一字之差，千里之别啊。老兄一定玉成我！”说完，两条云南产的“红塔山”牌精装香烟就塞到王科长的抽屉里。

王科长叫王天鹏，本是秦晓禾读研究生时的同学。他读的是农业经济专业，毕业后也留了校。东混西混，不知怎么的就当上了人事处的档案科长。两人原本住过一个寝室，一向烟酒不分，很投缘的。帮秦晓禾这个忙，对王科长来讲算是小菜一碟，何况还有两条“红塔山”。他二话没说，当着秦晓禾的面把他的人事档案找了出

来，凡是涉及“金融史专业”的表格、材料全部被他改成了“金融学专业”。这样一来，秦晓禾在应聘康平国际银行时填写的表格上，就当仁不让地把自己的三年教书生涯描写成教了三年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实践、金融风险防范等实用课程的响当当的经历了。康平国际银行派人去西南财大查了档案，证明秦晓禾在表格上所填非虚，就立即决定调秦晓禾到本行工作，并任命为信贷部经理。

秦晓禾如愿以偿，好不高兴。离开西南财大那天，他特地请王天鹏到财大门口最好的一家广东菜馆吃了顿海鲜，并且拍着胸口对王天鹏说：“哥们以后要贷款，一句话！”

4

秦晓禾信贷部经理干了还不到两年，就被提拔成了副行长，除继续主管他原来负责的信贷工作外，又兼管外资的引进。位高权重，炙手可热，当时他才刚满40岁。

秦晓禾的官为什么升得这么快？这里头有一个很偶然的因素，或者说，是运气。

康平国际银行还在临江宾馆内租房办公时，行长叫李大金，原来是市政府财贸办公室主任。市里在筹备组建康平国际银行期间，由市长夏聚炎提议，调李大金任筹备组组长。康平国际银行成立后，李大金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它的首任行长。

李大金生得短小精悍，50多岁了还一点都没发福，思想也一直很跟得上形势。康平国际银行成立后，他决定大力拓展国际业务。“用外国人的钱，为康平市造福”，是他在行务会议上反复强调的战略方针。这时，一个设在香港的P. H. 学会给康平国际银行发来邀请，说泰国曼谷要开一个“曼谷国际金融研讨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都有要员出席。日本、韩国、台湾、香港以及美、英、法、德等国和地区的大银行、大财务公司

也都要派人参加。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向亚洲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中国这种经济增长速度历年居高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贷款。邀请函请康平国际银行派三至五人参加，来回机票及在泰国的食宿自理。会期八天，其中讨论三天，参观访问五天。每个与会者须交给 P. H. 学会 8000 美元的会务费。

李大金年近花甲，还从未出过国门。接到这个邀请函，自然喜悦万分。于是李大金给市政府打了个报告，把组团去泰国参加“曼谷国际金融研讨会”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充分地论证了一番，要求市里批准。李大金知道，一下子要花几十万元出去，其中大部分还要用外汇，没有市领导的批准，日后要审计起来，弄不好会出漏子的。

市里的批示很快就下来了，是市长夏聚炎亲自批的。批文的内容是：“同意你行组团赴曼谷。为提高团组档次，市府决定该团由四人组成，市财政局局长以市金融学会名誉会长、康平国际银行名誉董事长身份参加。其余三人由康国行选派。李大金同志任团长。组团的原则应是老中青三结合，注意人员的梯次结构。出国经费(含境内费用)全部由康国行承担。”

李大金拿到了这个批文，犹如领到了圣旨，立即奉旨行动。他本人是代表团当然团长，市财政局局长安排为代表团顾问，这些都没有说的。问题是另外两个名额让谁去合适？让副行长去吧？这倒是照顾老同志，搞好关系的好机会，可是小小一个四人团组，如果厅局级干部就要占三个，而且本银行正副行长都列身其间，明显的是官多兵少、头重脚轻的格局。不合适，绝对不合适！也违反了夏市长人员要有“梯次结构”的批示。那就让副行长委屈一下，给他许个愿，下次类似的机会保证安排他，相信他不会有意见的。“梯次结构”几个字使李大金决定让资金计划部的小汪去。小汪叫汪家军，20 多岁，刚从山区一个石材厂调来不久。小汪初中毕业，没有任何金融专业知识，也没有从事金融工作的任何经历，惟一的经历是在山中打石头。不过汪家军有一条别人都没有的优势。他是